

關於文學的思考

陳雪風 著



千秋卷十七

關於文學的思考

陳雪風 著

評論集



千秋事業社 出版

千秋卷十七
評論集・關於文學的思考

作 者 □ 陳雪風

發 行 □ 傅興漢 POH HING HAN
出 版 □ 千秋事業社・馬來西亞
TIMES CREATIVE
27-B, JALAN KHOO TIEK EE,
551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FAX: 603-2410343

制 作 □ 紫藤藝術空間 PC IDEONICS
封面設計 □ 黃淑儀
初版日期 □ 1995年 8月
初版冊數 □ 1,000 冊
訂 價 □ RM15.00

圖書分類 □ [Chen, Xuefeng]

[Guanyu wexue de sikao]

關於文學的思考 / 陳雪風著
(千秋卷;十七)

ISBN 983-9768-09-3

1. Literature-History and criticism. I. Title.

II. Series: Qianqiu juan; shiqi.

801.95

尊重版權・請勿盜印

Dicetak oleh:
Percetakan Advanco Sdn. Bhd.
23, Jalan Segambut Selatan,
51200 Kuala Lumpur.

目 录

■ 第一辑

1.1	关于文学的思考	1
1.2	当你拿起笔	
	听王蒙的专题演讲有感	6
1.3	由文学不兴谈起	14
	附录：“文学不兴，在于……”	20
1.4	禤素莱·黄锦树和马华文学	22
	附录：“对文学的外行与对历史的无知” —就《马华文学》答夏梅	29
1.5	批驳黄锦树的谬论	37
1.6	厕所文章的质疑	45
	附录：《拉的哲学》	50

■ 第二辑

2.1	散文的渊源与品类	54
2.2	关于散文及文选导读	60
2.3	创作散文的要素	70
2.4	小说的人物刻划	75
2.5	谈谈诗歌创作的几个问题	82
2.6	关于朗诵	93

2.7	论现代诗及其他	102
2.8	战前马华小说的素质与技巧	111
2.9	十五年来的马华诗歌	134

■后记

后记	171
----	-----

关于文学的思考

1.

在廿世纪，文学曾经面对种种冲击与忧虑。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而它是关乎文学的存在与发展的。

当电视面世时，论者曾经由各个方面探讨文学受到“威胁”的可能性，结论是文学的繁荣肯定会受到影响。

科学技术的发展，日益翻新。而每当有一项夸越性的发明，极度地扩大了人们的视觉，而又将他们的听觉几乎无限地伸延起来的时候，对于文学，总构成一种令人忧心的冲击。

资讯太空化，而无边无际的天地与事物，已缩小在一个四方的荧光幕上，便可一目了然。

方格子（或电脑荧幕）上的耕耘，或是灯下的阅读，难道不会发生空前的遽变？

文学的生产者，经营者与消费者，处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空里，自然不会无动于衷，相反的是力求应变。

文学的创作，反映的是人类与其对现实与生活的体验认知的形象与理念，文学的创作，它是人类文化的艺术的表现。

因此，在廿世纪里，人类的文明虽然遭受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摧毁，但不论在西方与东方，文学却一直保持着坚毅的生命力，而且显得很旺盛。特别是西方，更是流派蜂涌，异彩纷呈。由十九世纪末的象征主义开始，一百年间，意识流、未来主义、表现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意象派、存在主义、新小说、荒诞戏剧、黑色幽默、魔幻现实主义、恐怖现实主义、新批评派、结构主义、无边现实主义、新新闻主义……。还有我们津津乐道的后现代主义与解构主义，林林总总，真是目不暇给。

这是文学面对现代化资讯发展的应变呢？或是显示文学的兴旺繁荣？

2.

在东方，文学界当然受到西方潮流的渲染。由于历史、社会与艺术本身的渊源与发展，特别是语文共识的范围以及翻译等因素，东方的文学，在现代化方面，本世纪以来，彷彿都处在追逐西方的潮流。

特别是华文文学，自本世纪初期的新文化运动之后，追逐西方潮流的现象，更是显而易见，而且几乎就是以西方潮流的马首是瞻。约半个世纪的时间，一方面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方面是“开历史倒车”的西方的现代主义，在规范整个华文文学的取向。

我不去想为什么竟是这样子以及相关的问题。这是大问题，牵涉的范围非常广。但有一个问题却一直在围挠着我 — 中华民

族的后裔，谁都能口口声声地说：“我们具有五千年悠久的历史文化，可是，当我们各据一方地在推动华文文学时，似乎都忘却了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文化”所孕育出来的优秀的文学遗产。甚至还在有意或无意之中自我否定。

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会竟是这样？问题在那里？是否是错了！？

我相信，不会没有人想到这些问题，但谁予理睬？谁又在作深一层思考？

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文化的中华民族，在海峡两岸，一方面曾经以半个世纪的时间经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而今却回头去追求朦胧的现代主义，一方面历经现代主义的颠覆，乡土文学抬头后，又在尾随后现代主义，结构与解构……

3.

面向海洋，放眼世界，迈进世界……

意识流深化了文学对人类心灵的挖掘；现代主义对语言变性的运用与破格的意象经营，丰富了语言的姿彩，艺术形象色泽；超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与新新闻主义，编造了文学想像与虚构的领域……

面向海洋，放眼世界，开拓华文文学的境界。

谁能质疑？谁不兴奋？

然而，面向海洋，放眼世界，感受了世界文学潮流，华文文学却困在潮流中旋转与浮沉，而迷失自己。

如果连自己都迷失了，创新是什么呢？创新，也许只在重蹈人家的覆辙。或者说是效颦西施。

从面向海洋，放眼世界，迈进世界的意念的角度，回头去观

察中华新文学八十年的发展历程，我们会有怎么样的观感？

要是我们不去感叹它在此段历史中的多灾多难，困挠了现代化持续发展，那么，我们当会觉察到在文学上的发展，似乎是辗转或胶住在世界文学长河曾经掀起的某些波峰上，而未曾与潮流并驾齐驱，汹涌地鼓起一阵浪涛，开创具有中华文化独特内涵的风格。

4.

世界文学曾经面临冲击而引起忧虑，但并未构成危机。

可是，在区域文学里，却有危机存在。

华文文学虽然在迈向世界，但也存在危机。

华文文学在追逐世界文学潮流上，有欣欣向荣的一面，但它在区域本土上所占的重要性与地位，却没有相应提高。

创作者的成品，也许是百花齐放，然而，消费者一读者，却在递减。中国大陆与港台如此，海外各国的华文文学，当然更不用说了。

文学读者递减，部份的原因是资讯发达，知识爆炸，而人们的阅读时间有限，不够分配所致。

至于主要的因素，公认的是：人们的价值观念改变，功利主义思想泛滥，注重物质享受的风气炽热。

然而，有一点，也许被忽略，那就是文学本身的吸引力，分散而微弱。

华文文学近半个世纪来，吹刮的风气，热衷的是横的移植，步在西方的后尘，陷本身于学习与模仿之中。在各个过程中，杰出的作品，少有跨越年代受到应有的承继发展；成了历史上的记录有之，被次品的文学与其他读物的书海淹没者有之，此外，更

有受到后来的论者与读者唾弃的。

文化是一脉相传的，但我们的文学发展，却欠缺了文化脉动的贯穿与联系。

我们认识与从事文学的心态是否出了问题？

这是必须认真省思的。

5.

华文文学有危机，华文文学要开创新境界，这都是当前的重要问题。

华人遍布世界各个角落，中华文化也在世界各个角落植根，华文文学开创新世纪，迈进世界文学的时刻，随时都存在。

问题是我们是否能把握时机？以什么姿态迈开步伐？

如果我们有雄心，雄心应以焕发文学体现民族文化与精神为基础，而不是追逐时髦的创新。如果我们有志气，志气不能脱离或背弃树立东方文学的形象。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四日)

(作者按：由各地区华文作家组织的《世界华文作家协会》，订于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廿三日在台北举行隆重的成立典礼，同时由廿四日至廿七日召开第一届代表大会。本文系作者受邀出席大会而撰写的，并曾在大会上发表。)

当你拿起笔.....

听王蒙的专题演讲有感

1.

三十多年前，当王蒙发表小说作品《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同时在中国文坛引起广泛的评论，而且因此掀起了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全国大规模的“文学战线上反右派”的斗争，那时候，我就听到王蒙的名字，也读了他的这篇作品。

王蒙拿起笔写这篇小说，很明显是有所为而为的 — 揭露生活中某些成为时代发展绊脚石的人物及现实的情况；他怀抱着希望现实生活能够按照时代的发展而展现新面貌。

印象中，我认为王蒙这篇作品是具有抨击因循苟且现象与官僚主义的意义。

但自那以后，直到八十年代之前，我就没有读过王蒙其他的

作品。不过，他的名字一直记在我的脑际。

知道王蒙受邀要来我国演讲，我就紧张地以最早的时间去索取入门票。因为我深信，如果我没去听他演讲，那是一项损失。

2.

我国关心文艺与文艺界的人士，似乎是“人同此心”，王蒙的专题演讲会，虽然会场没有爆满，假若运用记者的用语“反应非常热烈”，则不会有人持有异议。

一位朋友陪我在会场坐了超过两个半钟头，我们大概只低声地说过三两句话，即是说我们都很用心地听讲，以至到散会。

然而，对于王蒙演讲的内容，我个人却感到失望。相反的，倒是觉得主办当局代表在演讲前的致词内容，比较充实，而且明确，铿锵有力。拿督张晓卿说：“社会人士希望作家敢怒敢言，通过敏锐的触觉，成为社会的鼓手，时代的尖兵，可是他们却又吝啬付出一份应有的关心和支持，这是不公平的。”他也说：“作家的正义是常常为我们羡慕的。但是，在正义背后蕴藏的社会良知和道德勇气，及所承担的压力和风险，却是我们最忽略的。”

.....

话说很简单，明确有力。

即使不要说斩钉截铁，那也是一点也绝不含糊，或模棱两可。

它指出了作家的职责与本色，应该要有敏锐的触觉，而社会（我们）若希望他们为其触觉而敢怒敢言，成为社会的鼓手，时代的尖兵，那么，我们也要尽我们的责任与心意一一给予他们（作家）关心和支持，否则是不公平的。

张先生说的这些话，在我听来（理解）不是“客套话”，它是带着非常尖锐的批评意味。它批评“希望”而不给予关心和支持的“社会人士”。其实，这段话还含有更深刻的批评意旨，首先是：我们的作家现在的表现尚欠缺敢怒敢言。所以，“社会人士”希望他们这样做。其次，它也昭示：作家之所以没有“敢怒敢言”的表现，可能是因为触觉不敏锐，没有资格“成为社会的鼓手，时代的尖兵”。另一个原因就是“社会人士、对作家敢怒敢言吝啬付出一份关心和支持”。

更为难得的是张先生的这些话对现实的批评真是一针见血。眼前的例子是：近十多年来，虽然我们不少社团通过各种活动，表现支持与关心作家的创作。但最后却有某些社团与人士，对于某些作家的言论，千方百计地在寻求法律诉讼给予制裁；而另一方面，我们的一些作家，却滥用了他们手中的笔与在报刊上有固定“地盘”写稿的方便，以自己个人的饮食起居任所欲言，针对社会现象或异己等等，却胡言乱语，颠倒是非的批评等等。比如我们竟有作家公开大言不惭地宣示：我“写过什么转身就忘了”。也有人抨击社会对未成年的青少年在生活行为上进行一定的制约；诸如“廿一岁以下不可以进赌场”，以及“如果和一位十六岁以下的少女发生关系，就是强奸”等法律，是“错误的约束”，是违背与不“尊重人的选择”。

类似这样的作家，“社会人士”应该给予“关心与支持”吗？

3.

王蒙因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而被划为右派。二十多年后复出发表文学创作，特别是小说作品，由于立意在反映现实生活撷取题材与表现手法等方面，表现出很有创意，复在文坛引起

震动。王蒙复出发表的作品，独特的风格很突出；那就是作品具有幽默感的情趣，蕴含深刻的象征意味。他的〈布礼〉、〈悠悠寸草心〉、〈说客盈门〉、〈夜的眼〉，还有近期的〈坚硬的稀粥〉等，在中国大陆与海外，都一直引起注意与讨论。

王蒙毫无疑问是中国当代著名而前途未可限量的作家。

不过，他当晚所作的约如中学一节课时间的演讲，我觉得内容似乎较贫乏而有点杂乱。

“当你拿起笔 — 作家和社会”这个讲题，似乎可以分为两个部份；一是“当你拿起笔来时要或在做什么？二是作家和社会的关系。

王蒙将话拉得很长 — 由中国文学史说起，不过，剪裁与跳跃都很好，提到曹丕的“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就将新文学的创作观接上；在这方面又以“为人生而艺术”与“为艺术而艺术”来进行阐释，与此同时，他也略为说到当前中国文坛关于这方面的情况。

不过，这一切，总归说一句，都是属于文学史发展的一般过程的概述。我个人虽用心地听着，却一直不能与讲题“当你拿起笔 — 作家和社会”衍生出什么联想。

同时，王蒙在这方面提出的一些具体意见及见解 — 诸如：

“中国作家的传统一向不是把写作当作象牙塔里的事，作家希望通过文章改善人们的生活，使国家富强。”

而到了本世纪，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前后，这种传统更发展到“在中国面临生死存亡时，文人拿笔是救国，像鲁迅拿起笔是想着国家的命运。不过，在反省之下，自己认为正义的作家，原来也有过份的强调。”

肯定文以载道，“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是匕首是投枪；是时代的脉动与号角.....由文学是一种具体与形

象地反映人生遭遇与生活图象，让读者从中获得认识，开拓眼界，丰富知识，在潜移默化中吸取教育与启迪……之后，王蒙对“作家和社会”的关系却似有大彻大悟之慨地说：“不过，在反省之下，自己认为正义的作家，原来也有过份的强调。”

“自己认为正义的作家”何所指？

据我的理解，在这里，毫无疑问是指那些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自认负有着一定使命感在拿笔写作的作家。

王蒙讲了不少话，对文学历史作出简略概述，肯定“文学和社会”的关系必须含有批判与意欲“改变社会”的理念之后，却以“在反省之下……原来也有过份的强调”，就几乎给否定了。

我不知道这是王蒙研究文学理论与反省之后恍然大悟的昭告“高招”？或是只是当今文学界大气候的一种人云亦云？

4.

接着王蒙指出：“中国作家已认同了一些作家把文学看作个人的事情，没有任何目的进行写作。虽然作家也有不能脱离社会的一面，但是有些作家是没有任何追求，写作只是自己满意（笔者按：应是满足）。”

对这现象在中国出现的看法，王蒙“认为这是正常的。因为，文学是有非功利性的。当然，任何东西都有功利性，文学的功利性不应受责备”。

“任何东西都有功利性，文学的功利性不应受责备”；那么，我们对“文学的功利性”在“中国面临生死存亡时……”作出积极的要求与发挥，事后却冠以“原来也有过份的强调”，这是否是一种“责备”？

如果是的话，王蒙是否在自打咀吧？！

此外，王蒙似乎曾特别强调：“我们必须承认，的确有人在创作的峰巅时，只剩下艺术的感觉。”他在这里所说的“只剩下艺术的感觉”，那意思是“与人生与社会拉扯不上关系”。

其次，王蒙似乎也曾特别强调：“文学家应该承认文学对社会的直接作用是有限的，文学家不应企图通过文学直接改变社会”。

作为一个听众与文学爱好者和工作者，我充分体会到王蒙这两项强调是苦口婆心的话。因为，前者在“为人生而艺术”与“为艺术而艺术”的问题争得“头破血流”的一段很长的时期里，曾是一方面的证据。而后者，类似的论调，我们也早有所闻（可能中国例外）。实际上，我们早在六十年代之后！？作家早就认识到“文学对社会作用有限”，根本没有应该不应该给予“承认”的问题存在。

5.

听了王蒙针对“当你拿起笔 — 作家和社会”这个题目的演讲，老实说，不但没有比较明确的认识，对于这个题目所包含的一些问题，反而感到混乱。

我去听王蒙的演讲，除了景仰他在文学创作活动的成果，更想听听他作为一个作家“拿起笔”怎样想、想做什么？又为什么要那样做？换句话说，我想听听王蒙作为作家谈谈他或所有作为作家的人与社会有什么特别的关系？

然而，听了他的演讲，我对上述的问题似乎糊涂起来了。

在以前，当我拿起笔 — 虽然我不是作家，但我很清楚我要做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比如我发现生活中的一些问题与现象，可能说明与可能有什么演变或影响，我有些看法与意见，

想写出来告诉别人。如果我要进行文学创作，我也有我的用意与目的。……

现在，听了王蒙的演讲之后，似乎不管是谁，也可以不管要写的到底有何意思与用意，甚至可以不要知道你将写什么？“只是自己满足”……就可以拿起笔来！

无论如何，当你拿起笔，你就写吧！写吧！“没有任何目的的进行写作”，可以管也可以不管写了什么，或是与别人与社会有什么关系。这些都是无所谓，都是无关重要的事。

6.

关于作家和社会的关系，王蒙提出的见解：一是文学家应该承认文学对社会的直接作用是有限的；二是文学家不应企图通过文学直接改变社会。

这，我在前面已指出并不算是什么新见解。

在五十年代与以前的某些年代，有人将文学当作进行社会斗争的武器，而认为可以“通过文学直接改变社会”的观念与活动，曾经大行其道。中国大陆，就是如此。而它也曾在本区发生一定的影响。

现在我们虽然确定它是错误的，但却不应该以那个时代的历史错误，而喋喋不休地贬低文学和社会的关系。

除了权力，大规模的人民运动与战争，在我看来，别说是文学，根本就没有别的什么东西可以“直接改变社会”。然而，除了上述提到的具体事象之外，却有许许多多的东西，包括文学等艺术，可以间接（可能迅速也可以缓慢）地改变社会。

至于“文学对社会作用有限”或比较无限？

我的看法是不能一概而论的。